



# 竹林七贤与竹林之游

胡 旭

“竹林七贤”这一名称的出现，有一个过程。从现存材料看来，是先有“七贤”名称的。《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云：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此材料虽云七贤游于竹林，但只名为“七贤”，而不云“竹林七贤”。《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东晋袁宏《名士传》，云：

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

这则材料也列举了嵇、阮等七人，但其名称是“竹林名士”，没有“七贤”，也没有“竹林七贤”的说法。

东晋的戴逵有《竹林七贤论》，今存佚文若干，散见于《世说新语》、《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

书，逵文可能是“竹林七贤”这一名称的最早出处。

《世说新语·任诞篇》亦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则记载，显然是从《竹林七贤论》的若干条文中脱胎而来，并不是新的创造。但《世说新语》一书影响甚大，其对“竹林七贤”名称的广泛传播，是没有疑义的。

从上述材料看来，在竹林七贤生活的曹魏和西晋时期，似乎并没有出现“竹林七贤”的名称——至少在典籍记载上无法反映。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中朝名士在当时和随后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东晋名士对中朝名士的追慕，是“竹林七贤”名称形成的关键因素。关于这一点《世说新语·文学篇》云：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

北事，特作狡狴耳，彦伯遂以著书。”

从谢安的“特作狡狴”一语中，可以看出他在讲述这些江北名士生活时，故意添加了不少能引起人的兴趣以助谈兴而实际上却未必存在过的事，可是袁宏却将这些记录下来，成为《名士传》一书。袁宏就很相信谢安的话吗？似乎也未必，但是他可能喜欢谢安的口头创作，喜欢这些经过加工后极具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的《名士传》并不是历史的人物传记，而是文学的人物传记。

在与“竹林七贤”名称形成有关的东晋名士中，就年代而言，孙盛生活在公元302~374年间（另有二说，一为308~379年，一为320~391年），谢安生活在320~385年间，戴逵生活在326~396年间，袁宏生活在328~376年间，基本上差得不太多，孙盛、谢安要早一些，戴逵、袁宏晚一些。袁宏《名士传》来源于谢安之口的说法，至少是部分可信的。就家世而言，孙盛的祖父孙楚大约生活在218~293年间（甚至更早），官至冯翊太守；谢安的祖父谢衡大约生活于250~300年间，官至国子祭酒。孙楚和竹林七贤是同时代人，可能比较了解他们的生活；谢衡虽然生得晚一点，嵇、阮死时他只有十二三岁，但与其他五贤却还是同时的，对竹林七贤的生活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孙盛的《魏氏春秋》和谢安口头述说中关于竹林七贤的内容，显然是有一定由来的。《魏氏春秋》虽然名为历史，但实际上好异

爱奇，不见得比谢安的“狡狴”述说客观多少。袁宏的家世其实与竹林七贤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从曾祖袁准（字孝尼）和阮籍、嵇康是好友，关于竹林七贤的事，他知道的未必比谢安少。戴逵家族世系不很清楚，但他是谯郡铚县人，为嵇康的同乡后学，后徙居会稽，会稽又是嵇康的祖籍。戴逵对乡先贤嵇康的追慕，是很显然的。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与嵇康的才情技艺颇相仿佛。至于个性与行为，更为相像。《晋书》本传云：

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晔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

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国。

后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

戴逵的个性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嵇康的翻版。戴逵的《竹林七贤论》首先叙述的是嵇康，而不是阮籍和其他人，固然因为嵇康在竹林七贤中地位重要，更深层的原因还有戴逵与嵇康内在精神的相似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追慕。

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竹林七贤”的名称在东晋时期是比较模糊的，或称“七贤”，或称“竹

林名士”，或称“竹林七贤”，但由于《世说新语》、《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在当时和后世均有重大影响的书，多处称引《竹林七贤论》及其相关内容，故“竹林七贤”的名称在后世得到广泛响应，并成为一专有的名称；二，东晋文人强调个性且尚异爱奇，他们对竹林七贤的处世行为和个性特征极为歆羡，在追慕的描述中往往有一些理想化的虚构和夸张，他们笔下的竹林七贤部分远离了生活的真实，而成为文学化、艺术化的人物形象。

## 二

竹林七贤相互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亲疏。大体而言，阮籍、阮咸、王戎三人之间关系更为亲近；山涛、嵇康、向秀三人之间关系更为亲近；刘伶比较游离，相对而言，与阮籍较为亲近，嵇康次之。

阮籍与阮咸的关系亲近，无须多言。他们在血统上是至亲，个性上又相近，阮咸参与竹林之游，一定程度上是阮籍的带动。阮籍与王戎关系亲近，则主要源于他对后者极度赏识。《晋书·王戎传》云：

阮籍素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潞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阮、王相识的时候，阮籍已经三十九岁，王戎只有十五岁。《晋书·王

戎传》云“戎少籍二十岁”不确，据《晋书·阮籍传》，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年），年五十四，故知其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另据《晋书·王戎传》，王戎卒于永兴二年（305年），年七十二，故知其生于青龙二年（234年）。由此可知，阮籍比王戎大二十四岁。在无意的交谈中，阮籍发现王戎宅心玄远，洞达事理，情趣不凡，不禁被他深深地吸引了。阮籍高傲而缄默，兖州刺史王昶曾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可见话不投机的时候，阮籍是一言不发的。

阮籍对王戎的高看不只一端。《世说新语·简傲》云：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阮籍有美酒时，要找一个知音来喝，这个知音就是比他小二十四岁的王戎，他人即使在座，也不得一杯。如果说阮籍初见嵇康时曾青眼有加，那么日常生活中最让他时加青眼的无疑是王戎——任何人也不能与之相比。阮籍与王戎之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不仅一起饮酒，而且共同欣赏美色。《世说新语·任诞》云：“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可



见，在竹林之游以前，能有资格和阮籍一起饮歌啸傲的，大约连阮咸都不是，只有王戎。在竹林七贤中，亲密无间而随意笑骂的，大约也只有阮籍对王戎。《世说新语·排调》云：“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阮、王之间的对答是笑骂，这是他们亲昵的表现。一些学者将这一对答理解为阮籍对王戎的不满，甚至认为他们之间关系有了裂隙（赵剑敏：《竹林七贤》，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显然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王戎与阮籍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二人居丧时的表现：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

（王戎）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戎先有吐疾，居丧增甚。（《晋书·王戎传》）

毫无疑问，阮籍与王戎的内在个性与价值取向，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这也许和王戎自幼就受到阮籍的影响不无关系。有些学者怀疑王戎的行为是刻意模仿阮籍（高晨阳：《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就把阮、王二人间的关系简单化了，没有看到他们之间内在的一致性。阮籍母丧的时间大约在司马昭执政不久后，亦即公元256年前后。《世说新语·任诞》云：“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既云“晋文王坐”，司马昭继位为公元



255年，故阮籍丧母时间必在此后，姑定于是年。王戎母丧的时间，已经是平吴之后的若干年，大约在公元285年前后。《晋书·王戎传》云戎“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王戎在平吴后尚有一番绥靖行为，后征为侍中，然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故定其母丧时间为是年前后。两人母丧时间前后相差近三十年，而且王戎母丧时，阮籍大约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因而即便是模仿，这种模仿中可能也有另一种伤逝的情怀。

后人每每因为史传中记载王戎出奇的吝啬和贪婪，而硬要将其与阮籍分割开，这多出于维护阮籍人格的需要。王戎的吝啬和贪婪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目前还是个难题。即便是真的如此，这些行为也是平吴以后才为世人所知的。王戎一生吝啬贪婪行为，最早的一件事是平吴之后征为侍中时，接受南郡太守刘肇的贿赂，事见《晋书·王戎传》，此时距阮籍之死已近二十年。王戎早年的行为与此截然相反，其父死时，部下感戴其恩德，赠赙至数百万，他一介不取，更不要说其幼时的绝顶聪慧和超人胆识了。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避免的问题，一是先入为主，二是孤立静止。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观念、行为、节操等，在有些人的一生中可能

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如果因为后来的贪婪就否定此前的高尚，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阮籍死的那一年，王戎三十岁，他们之间交往了十五年。“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存，任性不羁”的阮籍与“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赏其要会”的王戎，虽然年龄相差了二十四岁，却可能是生活中真正的知己。阮籍对王戎的赏识，是他们之间关系亲近的基础。

山涛和向秀皆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因为同乡的原因，所以他们之间交往可能很早。《晋





养生论》，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这一篇文章比《养生论》要出色得多。《晋书·向秀传》谈及此事时云：“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如此说来，向秀对嵇康的辩难，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辩难，而是为了让嵇康更系统、更精密地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和理论观点。

因而，可以这样说，向秀与嵇康的亲密，更多地体现为向秀对嵇康的崇拜。

山涛与嵇康之间的关系不像向秀与嵇康的关系那样表面化，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在竹林七贤中，尽管思想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山涛最赏识的人，可能非嵇康莫属。正因为这样，山涛在由尚书吏部郎转为散骑常侍时，着实想帮嵇康一把，苦心孤诣地向司马昭推荐嵇康顶替自己。结果事与愿违，弄出嵇康给他的一封绝交书。但如果说这封绝交书完全是针对山涛的，未免有简单化的嫌疑，前人对这多有质疑，此处不赘。最能看出二人交情的，是《晋书·山涛传》中的一段记载：

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

“巨源在，汝不孤矣。”

这是千古以来最令人感动的一幅画面，有了这一番托孤的话语，山涛在绝交书一事上所受的全部委屈尽可烟消云散。嵇康没有将幼子托付给与自己齐名的阮籍，也没有托付给就像自己影子一样的向秀，而是很直接地告诉儿子，山涛才是会真正关心他成长的人。危难关头，方显出知己情怀。

因而，山涛与嵇康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之间的知心。

刘伶是一个澹默少言的人，他之所以加入竹林七贤的行列，是因为阮籍、嵇康的缘故。除阮、嵇外，看不出他和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五人有什么友谊。比如，山涛、王戎与刘伶的关系可能就很冷漠。《晋书·刘伶传》云：

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

刘伶既然去对策，说明他有意入仕。泰始初正是山涛在仕途上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刘伶的命运。但是，刘伶被罢免了。如果对比一下向秀与刘伶截然不同的命运，就不难想像山涛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疏了。有的学者认为，刘伶为建威参军时，建威将军是王戎，也就是说，刘伶是王戎的属官（李中华：《“竹林之游”事迹考辨》《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王戎的确做过建威将军，但似乎是平吴前夕的事，而不是泰始初或此前。其实，即便刘伶真的做过王戎的属官，可能也是缘于阮籍的关照，并不是他与王戎之间多么亲近。阮籍一死，王戎与刘伶可能就分道扬镳了。

刘伶可能是一个眼高于顶且目下无尘的人，也许他只瞧得起阮籍和嵇康。故《晋书·刘伶传》云：

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

在嵇康和阮籍二人中，刘伶与阮籍更为亲密。《世说新语·任诞》第5则刘

孝标注引《文士传》云：

（阮籍）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

阮籍为步兵校尉的时间，诸家看法不一，但至迟在甘露元年（256年）。刘伶和阮籍相交，肯定比这个时间要早。阮、刘二人相交的媒介之一是酒。阮籍可以喝得大醉六十余日，刘伶更是终日沉湎醉乡，使人荷锺随后，谓“死便埋我”，二人喝酒喝出的趣事可谓不胜枚举。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也喝酒，但除了阮咸，别人似乎并没有非常出格的举动。山涛的酒量可能在竹林七贤中是最大的，但从不喝醉，始终处于清醒的状态，如《晋书·山涛传》云：“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这和阮、刘之饮就有了本质的差别。阮、刘二人相交的媒介之二是精神上的相同以及由此导致的相似的放旷行为。《世说新语·德行》第23则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云：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

《世说新语·任诞》云：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竹林七贤中放旷到脱衣裸形程度的人，见于记载的只有阮籍和刘伶。刘伶有一篇《酒德颂》，塑造了一个“大人先生”的形象：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

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这无疑是刘伶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形象。如果将其与《世说新语》、《晋书》等典籍中关于阮籍和刘伶的记载进行对比的话，不难发现，刘伶笔下的“大人先生”，其实就是阮籍和刘伶的复合体。

由此可见，在刘伶的内心之中，阮籍的人格魅力是巨大的。刘伶的放达，某种程度上是对阮籍的效仿，效仿中又有一些变形和夸张。

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山涛三人与其他四人相较，更具独立性。如果竹林七贤中只有一个核心，那应该是嵇康；如果竹林七贤中有两个核心，那么是嵇康和阮籍；如果竹林七贤中有三个核心，那么是嵇康、阮籍、山涛。嵇、阮、山三人之间未必十分亲密，但更为知心。故《晋书·嵇康传》言及嵇康交游时云：“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世说新语·贤媛》云：“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类似记载不少，都突出了阮籍、嵇康、山涛



三人在竹林七贤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深层理解。

以上的论述,目的是要证明竹林七贤的各个个体之间,在出身、经历、个性、情趣、思想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差别甚大,这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存在着明显的亲疏。即便在他们同游竹林的时候,这种亲疏关系也客观存在。

### 三

竹林之游的时间,古今学者人言人殊。无论说法差异多大,竹林之游的最关键人物为嵇康,则是没有疑义的。因而,嵇康何时居于山阳,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文选》卷二十一颜延年《五君咏》李善注引孙绰《晋书·嵇中散传》云:

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向子期难之,不得屈。

《世说新语·德行》第16则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

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

拜中散大夫。

基于以上的材料,本文认为嵇康先自谯入洛阳太学,在太学中以才华出众、相貌超群而在士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得以成为长乐亭主之婿,然后迁郎中、拜中散大夫。至于尚主的时间,陆侃如先生推断为二十岁(见《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较为合理,这大致符合魏晋时期的婚龄规范。中散大夫是闲职,嵇康因此可以优游各地,山阳是

他最喜欢的地方,因此置有产业,长期居留。揆其所始,大约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即正始五年。据李善注引孙绰《晋书·嵇中散传》的记载,嵇康在洛阳时就已与向秀相识。未入仕的向秀,大约是与嵇康一同来到山阳的。嵇康和向秀是竹林之游的开创者。

同年,山涛为河内郡主簿、功曹、上计掾。山阳属河内郡,大约此时,由于山涛与向秀的关系,嵇康与山涛定交。竹林之游开始扩大。继山涛之后加入竹林之游的,当为吕安。吕安是嵇康的朋友,《晋书·嵇康传》云: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

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

从这样描述来看,吕安与嵇康的交情,绝不在其他六贤中的任何人之下。大概是嵇康的介绍,吕安与山涛、向秀也成为朋友。故《晋书·山涛传》云山涛“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晋书·向秀传》云向秀“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很显然,吕安也是竹林之游的常客。

正始九、十年间(248、249年),阮籍有一段辞官隐居的生活。《晋书·阮籍传》云:

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

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

诛,时人服其远识。

高平陵事件发生于正始十年正月,距此事一年多前,阮籍就辞官乡居。这一段时间,他有可能来到了山阳,参与了竹林之游。刘伶、阮咸、王戎大约也相随而来。山涛大约和阮籍辞官

归隐的时间相仿佛,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山阳。

因而,正始九、十年间,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吕安等。

大约嘉平元年(249年)末至嘉平三年(251年)八月(司马懿卒于是月),阮籍为司马懿太傅府从事中郎。嘉平四年(252年)正月,司马师正式拜为大将军,阮籍随后也被辟为大将军从事中郎。从司马懿卒到司马师任大将军,中间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阮籍也有可能到过山阳,和诸贤相聚。此时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吕安等。

嘉平四年正月以后,随着山涛、阮籍等纷纷入仕,山阳的竹林又冷落了下來,大约只有嵇康、向秀、吕安还经常会到山阳,继续着竹林之游。

景元二、三年(261、262年),即嵇康临终前约两年时间,他主要是在山阳度过的。嵇康之子嵇绍有《叙赵至》一文,可以大概看出嵇康最后二年的踪迹。兹节录如下:

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我?”至曰:“观君风器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

军中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之,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

《晋书·文苑传》亦云赵至事,大抵相似,但尚有可补充嵇绍文之不足者:

及康卒,至诣魏兴见太守张嗣宗,甚被优遇……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既而其志不就,号愤恸哭,流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这两则材料,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首先,嵇康在洛阳太学抄石经一事,可能发生在其母生病和去世前后,母亲去世后,他就回到了山阳。其次,嵇康在山阳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赵至也一直随他生活在山阳。吕安大约追随嵇康,也在山阳生活。正因为这样,才让其兄吕巽有可乘之机,以致出现家庭丑闻。从“嵇康被杀,向秀失图”一语,知道向秀显然是在山阳的。如此说来,竹林之游在嵇康临终前一两年,依然存在,参与者为嵇康、向秀、吕安、赵至等。

上面的论述,目的是要说明,竹林之游不等于竹林七贤的聚会,竹林之游有很多次,参与者不尽相同,竹林七贤参加的只是其中的一次或几次。竹林之游之所以被等同于竹林七贤的聚会,这是追求名士风流的东晋文人的认识,他们的一厢情愿的想像、附会,与实际情况有着不小的偏差。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